

學衡名家講演錄

第一卷

孙江 李里峰——编

Lecture Series of
Xue-heng Scholars

I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学衡名家讲演录

第一卷

孙江 李里峰——编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Lecture Series of Xue-heng Scholars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衡名家讲演录.第一卷 / 孙江,李里峰编. —南

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305-18423-9

I. ①学… II. ①孙…②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史学—文集③政治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6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学衡名家讲演录(第一卷)
编 者 孙 江 李里峰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302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423-9
定 价 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微信服务号: njuyexue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序

李里峰

1922年1月,由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吴宓、胡先骕、梅光迪、汤用彤、柳诒徵等人发起创办的《学衡》杂志正式刊行。至1933年7月停刊,共刊出79期,发表思想文化评论、学术研究论文、旧体诗词文赋千余篇。创刊号揭橥其旨趣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时光荏苒,激扬的文字逐渐泛黄,大师的背影已然远去,但《学衡》杂志和学衡派早已成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史上的“记忆之场”,其崇尚理性、反对极端、新旧交融、中西贯通之精神,也为南大学人奠定了值得珍视的学术传统。

进入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契机。一曰全球化。不同国家、区域、语种之间交互碰撞,各种话语、方法、范式之争层出不穷,闭门造车式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可能存在。二曰反本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洗礼,绝对真理、价值无涉已成镜花水月,真实与虚构、延续与断裂、同质与差异共生共在,本质主义渐为表象主义所取代。三曰跨学科。分门别类的现代学科建制不再壁垒森严,问题导向、视界交融、理论借鉴、方法多元日益成为学术生长的催化剂。如何迎接挑战,把握契机,今日学者当深思之。

2014年12月24日,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圣达楼报告厅隆重举行。未几,更名为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以学衡名之,既为彰显学术脉络,承继先贤遗风,也须预流学术前沿,树立时代风范,故倡言全球视野、本土实践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研究。此与学衡传统,实一脉相承。“学”者,以学术为职志,论究学术、阐求真理也;“衡”者,衡平古今中西,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也。一代人有一代

人之学术，然论究学术、理性衡平之精神，迨有超越时空之价值存焉。西哲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曾言：不要哭，不要笑，而要去理解。较诸学衡诸君所言，庶几近之。

以此而论，学衡者，非唯南大之学衡，亦为中国之学衡、世界之学衡也。学衡研究院成立之初，即筹设学衡名家讲坛，广邀学界同仁前来讲演交流。昔日学衡前贤，皆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大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循此传统，学衡名家讲坛不论中西、新旧，不拘流派、风格，唯以学术性、思想性、前沿性为据，所邀者多为中外学界的大师名流，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清茶一杯，或把酒言欢，有论道之愉悦，无俗世之喧嚣，岂不快哉！

秉承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学衡研究院拟将历次讲演实录结集付梓，名曰《学衡名家讲演录》。此为第一卷，收录16位中外学者的精彩讲演及现场互动，按主题大致分为“史学之林”、“概念之旅”、“记忆之场”、“个案之谜”和“当代研究”五栏。讲演文字俱在，无须赘言，仅略述其渊源如上，望读者鉴之。是为序。

目 录

编序

史学之林

解释“中国”的困境——从近世历史看中国	002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反常识的历史叙事——重审中国历史的若干命题	012
中国人民大学 杨念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一个全球的考察	020
美国罗文大学 王晴佳	
德国汉学史的三个断层	036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概念之旅

19、20 世纪之交的“新名词”和新国语	050
日本关西大学 沈国威	
近代中国的“思想界”	063
复旦大学 章 清	
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	074
台湾“中央研究院” 黄克武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以“次殖民地”为例的思考	092
台湾“中央研究院” 潘光哲	
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困境：现代性之冷酷与遁入特殊性	115
德国哥廷根大学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记忆之场

- 活着的档案 138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
记忆的力量: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149
美国西东大学 汪 铮(Seton Hall University)

个案之谜

- 时间开始了——陈独秀与中共早期革命 166
北京大学 王奇生
中国史上的无名外国战士——音吉, Lindley(伶俐), 鹿地亘 180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 菊池秀明
虚假宣传的真实效果——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揭秘 187
复旦大学 张仲民

当代研究

- 圣人与民众:论当代中国的民间儒家复兴 212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毕游塞(Sébastien Billioud)
初始条件与政治转型模式——兼论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 228
日本早稻田大学 唐 亮

史学之林

解释“中国”的困境——从近世历史看中国

葛兆光(复旦大学)

主持人语: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我国著名的文史专家葛兆光教授来给我们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做首场报告。葛兆光教授无须我多做介绍,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张名片。但我仍然想说一句话,为什么我请葛老师来给我们做报告呢?我本人也是葛老师的粉丝,20世纪80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读他的书,一路到今天。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向葛老师所创立的复旦文史研究院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也希望今后葛老师能继续指导我们的工作。接下来掌声欢迎葛老师演讲!

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其实稍微有点忐忑,因为这个题目多多少少有一点敏感。我的题目是——《解释“中国”的困境》,这是个语言双套的方式:是在学术上解释中国的困境呢;还是讨论中国的困境?你可以从两方面理解,解释“中国”的困境,也可以读作——解释“中国的困境”。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在解释“中国”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困境呢?现在的学术界,尤其是我们与美、日、韩的学术界常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它是一个传统帝国,现在已经是现代国家了吗?中国有多大的疆域?有多少个民族?留在历史记忆中的中国和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变动的中国到底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困境?这是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不是一个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一词,并把它当作文明的基础单位和历史的论述前提,但现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最近,许倬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华夏论述》,就是在讨论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他给我写信让我给他写一篇导读。我在写的时候已经觉得,像许倬云先生这样非常了不起的老一辈学者在解释“中国”的问题上已经面临困境。我虽然写了很长的导读,但在最后表明我多多少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中国”太复杂了,这是一个问题。

接着刚才所讲,这些历史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到海外交流的时候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归纳为“十大问题”。这“十大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简单地说:一、高句丽问题,这是中、韩、朝之间的问题;二、东海和钓鱼岛的问题,这是中国和日本间的问题;三、南海、南沙、西沙的问题,这是与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之间的纠葛;四、内蒙古和

外蒙古,这也会是一个问题;五、棘手的新疆与“东突”问题;六、西藏和藏传佛教的问题;七、台湾问题;八、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麦克马洪线”问题,“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问题”;九、融汇在中国内部的各个族群的问题,因为我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我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感想,我们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内部族群的认同问题?十、最近刚刚平息的香港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关键词(恰好在2012年哈佛中国基金会在上海开过一个会,准备资助一些中国研究的题目,我们当时十几个老师在黑板上写关键词,最后留下了五个关键词):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跨语际问题也很重要。对于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五个词变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我刚刚所说的这十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这五个关键词,实际上,简单地归纳一下,它是中国和国际的、中国和周边的以及中国内部的三重困境。所以我今天既要讲在解释“中国”这个问题上的困境,又要解释中国处于什么困境之中,这个题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是研究历史的,所以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讲。

我先从历史角度入手,讲一个比较远的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唐宋变革”,我个人的界定,“唐宋变革”是从755年安史之乱开始,结束于1005年澶渊之盟(大家注意,很多书上将澶渊之盟说成1004年,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它发生在旧历十二月底,那时候已经是1005年了)。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有点数字迷信,755—1005刚好是250年,两个半世纪刚好是一个周期,或者说漫长的过渡期。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的盟书要点很多,我挑三个来讲:一是“大宋皇帝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尊成信,虔奉欢盟”。这段话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时候大宋与大契丹是对等的两个国家,那么汉唐时代所留下的天下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许倬云先生在《华夏论述》中高度赞扬或者说非常留恋汉唐天下帝国,当然所有的中国人都留恋汉唐盛景,以前鲁迅讲的“汉人多少宏放”。可问题是笼罩四海的格局在宋朝已经结束,这个时候宋与辽不仅仅是对等的两个国家,宋还得输送二十万匹帛以及若干万两银子,甚至可以说,大宋皇帝与大契丹皇帝相比(为了买和平)地位还低了一些(当然,后来大宋皇帝和大契丹皇帝、大女真皇帝、大金皇帝相比,地位就更低,因为是舅甥之国)。笼罩四海、高居一切之上的天可汗帝国不复存在,所以要“共尊成信,虔奉欢盟”,搞一个和平条约。第二段我就不详细讲了,国与国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大宋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无限大的帝国了,而是一个有限的国家。第三是“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这个条约有神圣性,用现在的话讲,既有合法性,也有合理性,而且得到神圣的保卫。这时宋已经成为有限的国家,也是国际秩序中的一员,那时候已经有国际秩序了,而不再是天下秩序。

大家看这个地图,按照《宋史·外国传》,宋的周边都是外国,北宋这一块用我们现在的认知

来看,基本上属于汉族中国,“汉族”与“中国”是一个重叠的概念,而辽、金、西夏、高丽等都算是外国。这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我经常讲,宋代成为宋代,不是在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的时候,而是在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后,1005年前的宋基本上是唐代文化、政治和历史的延续。很简单,大家学一点历史的都知道,一旦处于平时时期,就出现了天书、泰山封禅等奇奇怪怪的事情,《宋史》里讲只有封禅泰山可以征服四海,夸示外国,向外国宣示自己的合法性。第二,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一旦和平来临,皇帝便会滋生奢侈之心,宋初让皇帝遵守祖宗之法,不轻易改变,墨守成规就行,但到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后来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这个道理。王安石是个好折腾的人,他的好折腾也是发生在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以后。第三,我们现在的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都把孙复、胡瑗、石介叫作“宋初三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你算一算,他们登上舞台之时,宋朝已经建立80余年,如果按照朝代的划分,他们只能称为“中期先生”了,可是为什么要叫宋初三先生呢?因为他们登上文化政治舞台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了,此时的宋代才真正成为宋代。第四,大家要注意那个时候的一个特殊现象,到宋真宗时出现了一个最有意思的大变化——南方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澶渊之盟以前都是北方人当宰相,宰相王旦曾对宋真宗说怎么能用王钦若。可是后来王钦若当了宰相,他是南方人,王钦若因王旦的一句话晚当了十年的宰相。大家要注意,宋代最后形成有宋代特色的文化人,南方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唐宋八大家中很多是南方人。南方人与北方人还有一个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欧阳修与司马光同属一个阵营,可是他们之间发生过的最大争论就是科举考试中南方与北方的名额之争,司马光说北方人不擅长文学那一套的东西,所以要搞经术,表面上看是文学和经术之争,但背后还有南北之争。

但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胡汉问题。北大的邓小南教授在她的《祖宗之法》一书里说,北宋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是胡汉问题的消解。这是对的,但我要补充一下,宋代胡汉问题在内部消解了(唐代的胡汉问题是在内部),但转为了外部问题,即“华”与“夷”、“内”与“外”的问题。“我者”,即汉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是外族。这样一个胡汉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有限的、以汉族为主的、抵抗外来宗教的国度,外面的国家如契丹、西夏的文化、族群均与我不同。所以澶渊之盟的誓书很重要,它将宋与唐截然划分开来,唐代的皇帝认为自己是天可汗,但到了宋代,虽然赵匡胤也有这个意识,他说“未离海底千山黑,月到中天万国明”,似乎气魄很大,但实际上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虽然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但说实话这个卧榻也太小了。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一个在民族、疆域、文化认同上清晰且单一的汉族国家开始形成了。这是一个从秦到清不断变动的疆域,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宋代帝国疆域的收缩和有限国家的肇

始。关于什么是帝国,这个问题我现在无法讲清楚。去年美国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专门到复旦文史研究院讲“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他认为只有清是一个帝国。我们暂且不管他的看法,先来回顾历史。

中国自秦以后大体上形成了一个中心清楚、边缘变动的国家,但到了宋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中国不再是天下帝国,而是处于多国秩序之中,形成了“我者”与“他者”界限清楚的中国。尽管至今中国人的心底仍残存着天下意识,我的一些学界朋友特别爱讲“天下”,认为“天下”这个词可以无限扩张,为很多行为做合法性论证,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提倡“天下”,提倡“天下主义”,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我们把话说回来,大家看那时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帝国,南边大理国与安南是最典型的论据。唐代大理(云南)是中国的,宋代大理(云南)就不是中国的了,在《宋史·外国传》中云南是外国的,直到后来元代收复回来,而真正把它改造成具有中国属性的是明朝。安南(越南)国王自称皇帝,不在宋的管辖范围内。北方的大契丹国和后来崛起的女真显然是一边一国。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宋仁宗回答契丹国的国书,契丹皇帝用了“北朝皇帝致书南朝皇帝”,这时南北还是一家,于是宋仁宗发这个国书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坚持认为不能用南朝北朝,一定要用“大宋皇帝致书大契丹皇帝”,那个时候是不支持一国两制的,而是支持一边一国,因为胡汉华夷不可以通融。再看西边,西夏与吐蕃自古以来并非中国的领土。在宋初八十年中对西夏的争论非常多,很多大臣认为那里“千里黄沙,本非华土”,应让其自生自灭,无须收复。有些人认为这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有个大臣便说如果用“失地”来形容西夏,那么幽燕八州、河湟五郡都可以称为“失地”,大宋失去的土地多了,何必非要收复西夏呢!这是宋真宗时期最有名的文人杨亿所说。这个结果构成了宋代的国家形态,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严格地用现在西方的学术语言来形容的话,即近代性与传统性纠缠在了一起。

在国际上,对等的敌国意识形成了。《宋史》是第一部区分《外国传》、《蛮夷传》的史书,这说明周边的“野蛮”民族还算是我们国家的,但《外国传》写的是外国,国家的界限开始清晰。在领土边界上,已经有了各守边界的观念,边市贸易逐渐发达,如雄州的边市,泉州、宁波、广州等地设的市舶司等。同样,宋代开始有“国民”概念,国内有国事的讨论,即共识的形成,这个我就不再仔细讲了。

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实际的策略转向想象的秩序,从真正的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为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比如我曾经研究过乾隆八十大寿时,安南国王到承德来祝寿,送了点土产,乾隆帝赐赏二十三次,安南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说厚往薄来是中国朝贡体制的原则,你只要承认我是了不起的天朝大国,我就赏赐你很多东西。在政治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识

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裔”的主流观念，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把自己想象成天朝）的民族主义，宋代的民族主义是何等的厉害。学文学的人可以去检查一下，唐诗中主战与反战的诗都有，但到宋代，很难找到一首反战的诗词，如果有人说打仗很惨，那这人肯定是汉奸。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是最麻烦的，宋代将一个天下帝国变为一个有限的、类似民族和国家的实体，我们不能说它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词不太好用，但我们可以说“民族”与“国家”大体重叠。假如宋王朝没有灭亡，会怎么样？中国是否变成了一个汉族国家？正如欧洲那样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意大利人马蒂尼讲的一个民族只能有一个国家）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可能形成。但宋朝灭亡了，之后的三个王朝给中国带来了三重麻烦，也就是周边、国际和内部的麻烦。

第一个是蒙元王朝时期，帝国很庞大，但当蒙古军队踏平千里，笼罩四海之时，中国周边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也逐渐崛起，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内藤湖南曾多次讲过这个道理，蒙古袭来刺激了日本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得日本的国家意识开始崛起，因为蒙古大军所向披靡，日本被蒙古大军打败了，日本的自我感觉却日益崛起。同时，高丽、安南等国亦是如此。所以，即使到了蒙元时代结束时，周边各个国家的自我意识仍开始崛起，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中国仍停留在过去我笼罩四海，你们都是我的小兄弟的心态中，实际上，经过这些后，此时的周边各国已不再认同中国的核心地位，不把你当大哥，如果你还顽固地延续这种观念，就会与周边发生矛盾。

第二重困境来自明代，明中期正德年间，一个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西洋人、西洋文化与思想进入中国的历程，中国从此被拖入了一个不同的国际秩序里面，中国历史必须被整编到全球历史中，中国文化也将面临欧洲文明的挑战。我一直不太同意中国遭遇西方只是在清代或者清代中后期的看法，其实从利玛窦时代以后，中国就已潜在地存在这种危机，我在《中国思想史》中用了两章来讲“天崩地裂”。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但天文、地理以及有关世界的知识在中国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天子的合法性与之有关，天文历法在中国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政治。明代还有一个问题，它的集权、移民、垦殖、修通道路强化了“汉族中国”的统一性，这在许倬云先生的《华夏论述》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我觉得很有道理。原本中国各地各有特色，但到了明代，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高度的权力压迫，把一个制度化的东西推进到各个地方，南京应该最了解这一点。当年明朝是哪个地方人少往哪个地方移民，移民也将整个国家同质化了，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把西南地区州县郡建制化，不再由土司管理，变成了国家的有机部分。由于形成了同一性的汉族中国王朝，

它与西方开始遥遥相对,朝贡体制与国际秩序哪一原则来支配世界,知识基础、宗教信仰和思想取向,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如何消解,传统帝国与近代国家的制度差异如何解决,这都是中国进入国际秩序后出现的问题。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第三重困境,即内部族群问题,这是因大清帝国版图扩大而形成的内部问题。本来,后金(更早期是女真)部落最初是满族,未入关时就建立了蒙八旗,即满蒙帝国,1644年以前编汉八旗——满蒙汉帝国形成。1644年入关后,收复台湾,便形成了兼有汉、满、蒙的帝国,之后一连串地战胜大小和卓、平定准噶尔,形成了满蒙回汉帝国。乾隆年间,福康安后来把西藏带进来,成为满蒙回藏汉帝国。也有人说雍正年间大体结束的“改土归流”将广义的苗(西南夷)收编,满蒙回藏汉苗的大帝国形成。但问题是,宋、明时中国很有限,明代有一句话“嘉峪关外非华土也”,我的一个朋友林梅村教授帮博物馆整理蒙古山水地图,其中标的很清楚,嘉峪关以外就是外国。大家看明代的一个《四裔图》,四裔之外均不是中国国土。但《清史稿》中记载“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那时候大清帝国的版图可大了。所以,一方面,中国有一个汉族的传统,汉族人总认为大禹治九州,到明朝十五省,清朝十八省,外面都不是中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像刚才讲的,又认为北到兴安岭,东到库页岛,西到疏勒和葱岭,南到海南岛都是中国的,这里面中国的性质不能用欧洲简单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讨论。所以,我在《宅兹中国》中讲了一段话:中国并非像欧洲那样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传统中央帝国的痕迹。^① 所以,中国是一个被国家意识纠缠得很复杂的帝国。

我们要开始讲第三个问题,即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何理解中国的复杂性? 早期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觉得“支那无国境”,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包括很多和中国很友好的日本学者都认为中国应该回归到长城以南变为一个单一的汉族国家,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就是这样一个论点。其次,现代学界以欧洲为标准的“民族国家”样式,把中国看成一个并没有实质同一性的帝国,最多是一个“文明体”或“文明国家”,这是最近流行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23—)的《论中国》和英国人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1945—)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的观点,并由此衍生出以“文明”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马丁·雅克就是一名记者,他特别爱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究竟什么是文明国家,我们也不大搞得清楚,但他的说法得到了国内很多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29页。

人一致的欢呼：“对，中国特殊，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中国国家也该有中国国家的模式。”）。第三种说法是后现代理论，将中国看作一个庞大的、没有同一性，只是依赖“想象”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这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讲的“想象的共同体”。后现代我历来尊敬，但以我的看法，后现代就像过铁索桥——不断地拆桥板，最后可能连自己的桥板也拆掉了，拆下来不成片段。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现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可是他所熟悉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和中国不一样，换言之，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不可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

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过去都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的说法：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可以说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的国家，一方面开始通过有限的国家边界和条约来进入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支持天下想象的儒家学说已不再是主流，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1920—1969）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便持这一观点——从传统到现代。但我要强调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脉络，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虽然确实有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但近代中国也有另一个“纳四裔入中华”的反过程。

从大清帝国到民国，在中国建国模式的问题上有两派不同观点，一派是采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极端汉民族主义策略建立中国，以章太炎、孙中山、陈天华等为代表，但也有另一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认为要维护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现代国家也要按照这个大家庭来。可是革命派夺取政权后，在很多因素影响下，不得不反过来采取保守派的策略，“五族共和”因而成为重要的口号，特别是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日本的因素非常重要，先是1894年的甲午海战，1895年的《马关条约》，后来新政受到日本的影响，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感到的危机，大家都在捍卫“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等人。1935年傅斯年有篇文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9年顾颉刚写了一篇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本来不屑于说中华民族统一渊源、统一地域的顾颉刚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抗战时提出要重修教科书，维护中国统一。当时教育部在1935—1936年中曾发过指示，不许在教科书中讲民族问题，认为这是分裂国家。陈寅恪先生说这不是倒退吗？可是像陈寅恪这样很理性的人比较少，大多数人在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都接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理论。最后将这一理论说得最清楚的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可见，“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裔入中华”两个脉络经历了一个纠缠的过程，一方面，好像要从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向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要努力将四裔即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华，恢复天下帝国，两个脉络的纠缠对现代中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历史脉络中保留下来的。

大家都知道，两千年未有之巨变，它（中国）好像是一个“国家”，但好像也是一个“帝国”。我

的感受特别深,很多国家电视台的新闻都只关注自己本土,只有两个地方国际新闻特别多,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中国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谈论天下大事,所以天下帝国的胸怀与历史记忆实在是太深。中国又有一个被压抑的过程,经历了晚清以来的巨大冲击,不得不从“在传统内变化”转向“在传统外变化”,因此带来很多政治麻烦与思想问题。其中有三个是最根本的,第一个是“现代”,直到现在都在争论,中国应该走西方现代之路,还是走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现代?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多种现代性的说法比较受欢迎,也很合乎中国人自树其帜的想象。第二个是“国家”,是走向民族国家,还是捍卫汉唐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的大一统帝国?我们的民族国家要加一个字即“多民族国家”,费孝通先生讲的“多元一体”理论是煞费苦心地去诠释国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第三个是“文化”,是接受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还是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的特殊性?是承认自己的文化受到冲击而衰落,还是恢复中国文化在世界至少是在东亚或者亚洲的崇高地位?这都是很矛盾的,我们现在的很多思想问题都与我们近世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我要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矛盾,那么多历史造成的结果,其实说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周边关系,第二、中西冲突,第三、内部问题。所以,我今天完全没有结论,也没有给大家带来灵丹妙药,历史学家是半个医生,他只有诊断病原的能力,没有开处方的权力,所以后边的半个问题留给政治家。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应“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或者加一个宾语“中国改变世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既包含了解释中国存在的许多麻烦,也讲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麻烦,以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即从历史上去理解它。谢谢大家!

提问互动

提问:您的《想象的异域》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新清史、东亚研究学者以及民间史学领域,印第安纳大学的蔡伟杰博士将您的研究和新清史研究对满文档案的关注相提并论,并将您的研究视角和台湾少数族裔的视野做比较,但我觉得他没有提出一些真正的不同。那么您如何看待您和新清史学者的区别?

葛兆光:如果说我和新清史研究之间有瓜葛,这大概是一个误会。我在《宅兹中国》第一篇文章中对新清史有不少批评,我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但和他们并不是同一战线的盟友,我和我的好朋友欧立德之间有不少的学术交锋。关于台湾少数族裔,我在批评的五个对象中也包括“同心圆”史论,我一直很尊重台湾学者发掘少数族裔和边缘族群认同的意义,但我不赞成把这些东西放得太大,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要重新发潜德之幽光的东西。我遵循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问题,既然它已经整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与中国形成了复杂的纠葛关系,我们就应该把

它放在中国史的脉络中。你看我关于《燕行录》的研究,我和韩国学者的差别非常大,韩国学者是把《燕行录》作为自己的史料讨论自身的问题,我是从周边看中国,焦点还是中国。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葛老师。不管“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义是什么,或者中国内部有多少个族群,今天解释中国之困境的答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我们今天权力所及的范围就是中国?就国家和权力的先后问题,我认为是权力在先,才有国家。就这个层面上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葛兆光:我想做一补充,权力所及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对“国家”、“政府”、“祖国”这些概念做一定的区分。而历史学家不谈论政治,权力所及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其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是通过谈判、条约来确定的,现在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之所以现在对领土问题产生新的讨论,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福柯提出的概念,如权力和地图的关系,他认为地图是将领土政治化、合法化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对地图非常重视。这其中和历史学产生了一个冲突,比如外蒙古的问题,历史学家说,它曾经可能是中国的领土,但我们不能代替政治学家说,这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一定要区分很多概念,理性最重要之处在于区分历史家和政治家所讨论的问题,国家、政府、祖国的概念是不同的。当然“中国”这个话题太复杂了,谁把“中国”这个事情说清楚了,谁就应该拿十个诺贝尔奖,但我们现在都说不清。

提问:您最近比较关注东亚中、韩、日三国不同的走向,您在《宅兹中国》一书的最后也提到了东亚区域史,那么,我们在讨论从周边看中国的话题时,是否也要注意从中国看周边,包括东亚区域史这样的历史叙述方式,和以国家为主体、有明确政治界限的叙述方式,它们之间如何衔接?如何对话?

葛兆光: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讲东亚这个概念,和许多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朋友讲的有点小小的区别,尽管这是一个共同的区域,但内部的差异性和彼此的不认同是很强的,所以我把焦点放在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以后,可看到这一时期中日韩越之间彼此的不认同。我之所以强调不认同甚于认同,是要改变中国人传统以来一直习惯的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中国文化光被四表这样的一些说法,中国已经不是天朝,我们要懂得如何妥善地处理彼此长久互不认同的东亚各国间关系,东亚虽然共享一个历史,但一个历史中有很多矛盾,这是我特别想要说明的地方。